

明史十讲

陈梧桐 彭勇 著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明史十讲

陈梧桐 彭勇 著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史十讲/陈梧桐,彭勇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6.3
ISBN 978-7-101-11447-8

I.明… II.①陈…②彭… III.中国历史-研究-明代
IV.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5791 号

书 名 明史十讲

著 者 陈梧桐 彭 勇

责任编辑 陈 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½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447-8

定 价 36.00 元

绪论



明人绘《大明混一图》

明代的历史长达 277 年,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特别是被称为天崩地坼的晚明时期,社会形态更是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因此,明代的历史不仅以其诸多的突出成就引起世人的瞩目,更由于晚明的社会变迁而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明代距离现在不算太久远,保存下来的史料极为丰富,这就为明史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明史研究因而也就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明朝的历史分期及其成就

代元而起的明王朝,从明太祖洪武到明思宗崇祯共 16 帝,历 17 朝,长达 277 年。明王朝是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统一王朝,又是中国古代社会晚期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一方面是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极度成熟的地步,另一方面则出现种种新因素,呈现由中世纪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新气象。从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及其总的趋势来看,明朝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前期——开创时期,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建国到正统七年(1442)王振专权。其中,从洪武元年到宣德十年(1435)的“洪永熙宣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盛世。(二)中期——积弱与改革时期,从正统七年王振专权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三)后期——衰败时期,从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明神宗亲政,到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明思宗自缢、明朝灭亡。

明朝建国之初,尽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刚刚平息,各种社会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经济凋敝残破,统治很不稳定。为了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明太祖称帝后,一面调兵遣将,将元朝皇帝赶出大都,逐往漠北,逐步实现了全国统一;一面大刀阔斧地改革国家机构,强化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力倡程朱理学,革除元朝弊政,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此后,雄才大略的明成祖将太祖开创的基业积极加以拓展,明仁宗、宣宗又力加

守成，弼成“洪永熙宣盛世”，奠定了当时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强国地位。郑和下西洋，以其庞大的船队和先进的航海技术，将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半岛延伸到非洲东海岸，开辟亚非之间的交通网络，凸显了明朝在世界上的影响。明宣宗去世后，年幼的明英宗继位，宣宗朝辅臣“三杨”继续辅政，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进入明中期，社会生产力继续快速发展，白银日趋货币化，农业生产日趋商品化，农民纷纷流入城镇从事商品生产，一批工商业市镇迅速崛起。私人海外贸易日渐兴盛，并迫使明廷在隆庆年间开放海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江南一些工商业城镇破土而出，经济结构内部开始出现缓慢而重大的变化。城镇居民逐渐兴起一股拜金逐利、奢侈享乐的风气，违礼越制的现象层出不穷，王阳明建构的心学体系，更对程朱理学发起挑战。至成化、弘治年间，明代社会已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在商品、货币的刺激下，大地主集团的胃口更加膨胀，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赋役征派日趋苛重。社会政治日渐黑暗腐朽，除景泰年间、弘治前期和嘉靖初年的政治有所起色外，其余绝大部分的时间里，皇帝或风流荒唐，纵情声色；或佞佛崇道，热衷念佛斋醮，从而懈怠政事，导致宦官与权臣迭相专权，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正统后期，先是爆发邓茂七、叶宗留起义，后又发生瓦剌南下、俘虏明英宗的“土木之变”；成化和正德年间，又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和刘六、刘七起义；到嘉靖年间，更形成鞑靼不时南下骚扰和倭寇不断入侵东南沿海的所谓“南倭北虏”的局面，葡萄牙殖民者也窃据澳门。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在嘉靖初年和隆庆年间掀起了一股改革浪潮，至万历初年，形成集大成的张居正改革。

明后期的商品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继续缓慢向前发展，全国性市场初步形成，并向世界延伸，海外贸易迅速增长，大量白银滚滚流入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逐利与奢侈之风更加盛行，违礼越制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由心学发展起来的泰州学派，以及被称作“异端之尤”的李贽，更是高举反传统的旗帜，倡导人性自由、行为解放、满足私欲、贵贱平等的启蒙思想。作为心学的逆动，实学思潮也悄然兴起。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批判理学家空谈性理的同时，积极倡导实学、实功、实用，讲求经世致用、治国兴邦之术，实现富国、强兵、足民的理想。由西方传教士输入的近

代科学知识,也为一些有识之士所接纳,古老的中国,正处于由中世纪迈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然而,大地主集团却更加贪婪、侈靡,疯狂地对广大农民和城镇居民进行压榨和掠夺,导致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统治集团也更加腐朽。明神宗亲政以后,长期不理政事,连国家机构缺员也不闻不问,只顾聚敛财货,寻欢作乐;明光宗沉湎酒色;明熹宗嗜好玩乐。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林立,争斗不休,专制主义统治已难以维持,对社会的控制日渐松弛。建州女真乘机在东北崛起,建立后金(后改为清)政权,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侵占我国的台湾。为了对付内忧外患,明朝统治者耗尽了国力,最后终于为农民大起义的浪潮所埋葬。随后入关统一全国的清王朝,重建社会统治秩序,晚明闪现的变革曙光随即消失,古老的中国依然未能走出中世纪。

尽管如此,明朝 277 年的历史,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是引人瞩目的。

第一,在政治上,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的强化,意味着对人民的统治和压迫的加强,具有束缚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但它又是当时社会条件的产物,客观上包含有某些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因素,反过来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某些积极的作用。这集中表现在:由于专制中央集权的加强,明王朝得以集中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特别是牢牢地控制着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内得以迅速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叛乱和少数民族贵族的分裂活动,制止蒙古贵族卷土重来;对外得以有力地抵御倭寇和其他外来势力的侵扰,维护和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捍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同时,由于集中了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明王朝得以举办许多规模宏大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工程,如营建中都、南北两京、明皇陵、孝陵、显陵和众多的庙宇宫观,修筑长城,治理大运河和黄河,编纂许多大型类书、丛书和佛藏、道藏等,其中的许多大型工程在时过境迁之后,其政治和军事功能日渐消失,而历史文化价值却日益凸现出来,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第二,在经济上,农业和手工业得到空前的发展,生产力的总体水平超过宋元时代。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万历三十年(1602)全国的耕地面

积达到 1161 万余顷^①，这是清代直到雍正年间都未能超越的数字。造船、纺织、矿冶、制瓷、造纸和印刷的生产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白银的货币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加强，工商业市镇的勃兴，地域性商人集团的崛起，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空前繁荣，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及世界市场建构的参与，国家的财政体系从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全面转型。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某些新的变化。明中期以后，在江南一些手工业作坊，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开始采用雇佣劳动、组织手工业工场的经营形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到了晚明，中国已处在由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之中。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推动晚明社会转型的物质因素。

第三，在民族关系上，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边疆地区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回、撒尼维吾尔（裕固）、土、撒拉、东乡、保安等就是在明代最终形成为民族的。分布在东南、华南、西南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诸民族，其族体及地域分布，也在此时趋于稳定，从而为我国近现代民族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王朝大力倡导尊孔崇儒，并积极兴办教育，通过各级学校，将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由内地向边疆广泛传播，渗透到各个民族之中，从而增强了各民族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主要条件，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感。明王朝还空前强化了对东北黑龙江流域和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在黑龙江流域设立奴儿干都司，在西南边疆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又在土司周围设置府县和卫所加以监视和牵制，一旦土司发生叛乱，即出动大军加以镇压，实行改土归流，从而加强对东北和西南边疆的管理，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第四，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睦邻外交政策，继续发展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涉沧溟十万余里”^②，不仅加深

^① 《明神宗实录》卷 379，万历三十年十二月丙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校勘本（以下所引《明实录》皆出此版本）。

^② 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

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谊,同时也拓展了海外市场,促进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隆庆开后,由月港经吕宋至美洲大陆的太平洋航线的接通,更进一步密切了中国与海外市场的联系,促使了中国的经济融入世界。随着耶稣会士的东来,中西文化以和平的方式,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欧洲与中国的社会变革。对于外来势力的侵扰,明王朝则坚决进行抵御与还击。在嘉靖年间,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率领军民平息了长期侵扰我国沿海地区的倭寇。万历年间,又应朝鲜的请求,出兵助其击败日本侵略者。此后,爱国军民又击退了葡萄牙殖民者对我国广东、浙江和福建沿海岛屿的侵犯,而郑成功领导中国军民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更是世界反殖民主义斗争史上的壮举。

第五,在科学文化上,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理学式微与启蒙思想、实学思潮兴起,传统诗文衰落与小说戏曲勃兴的景象,使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幅新与旧、先进与保守、新生与腐朽相搏的斑斓场景。在科学技术领域,先进的科学家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亲身参加生产实践与科学实验,对传统的科技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并注入近代化的因素,有的还吸收了刚刚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做出许多发明创造,写出一批享誉世界的科学著作。十二平均律的创建,《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徐霞客游记》及《天工开物》等巨著的涌现,表明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仍居于世界的前列。即以天文学而论,徐光启可与同时代西方的培根、伽利略、笛卡儿并驾齐驱,其理论方法比东来传教的利玛窦所掌握的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式的天文学理论更为先进。利玛窦在同徐光启等人交谈后,赞叹说:“他们计算日、月食的时间非常清楚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人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①

明王朝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使它的综合国力在亚洲乃至世界长期处于优势的地位。即使后期国势衰敝之时,其经济发展水平也较欧洲略胜一筹。在这个新旧杂陈的朝代,已经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① 转引自《中国天文学史论集》第6卷,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但明清的易代,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落后的满洲贵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不仅实行野蛮的军事征服和屠戮,而且将其政治上的民族压迫和歧视、经济上的农奴制、思想文化的钳制禁锢、对外关系上的闭关锁国等政策推向全国,导致政局的长期动荡,经济的凋敝衰弱,思想文化的万马齐喑,外交的与世隔绝,从而使中国逐步落后于西方。

扭曲和贬抑明史的几种观点

明朝长达 277 年的历史,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孕育了新旧交替,迈出由中世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步伐,具有鲜明的特点。然而在一些人眼里,明朝却是个灰暗的朝代,其评价不仅远逊于秦汉唐宋,甚至还不及元朝和清朝。这究竟是为为什么呢?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清朝统治者在组织编纂《四库全书》时,下令将有“抵触本朝之语”的图书“尽行销毁”^①,毁灭了与《四库》所收书籍种类几乎相等的三千余种图书^②,造成明史史料的大量缺失,许多重要的历史环节难以复原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受到中外诸多贬抑、否定明朝观点的影响,造成对明史的种种误解和偏见。

最早对明朝作出评价的是清初的明遗民。他们在痛定思痛之后,对明朝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总结,提出不少至今仍具参考价值的观点。不过,当时的总结,多着眼于明亡的教训,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使明史蒙上一层灰暗的阴影。而清初迭兴文字狱,更进一步压制了对明朝的正面评价。而清朝统治者组织的明史编纂工作,则贯穿着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彰显清优于明的原则,特别是清圣祖为论证“自古得天下莫如我朝”而发布的“面谕”,更是极力抬高其先祖的“业绩”,贬低晚明的成就,清高宗则借修纂《明通鉴纲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四库全书》、《历代职官表》和“续三通”,极力“推崇清朝的‘功德’,把明朝有显著成绩的地方一笔抹杀”^③。《四

① 《清高宗实录》卷 964,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丙戌,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

② 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

③ 谢国桢:《明清史丛谈》,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8 页。

库全书》总编纂官纪昀纂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更认定“明人积弱，自其盛时已然”^①。乾隆朝修史，曾极力宣扬所谓“清承明制”。其实，清对明制的继承是“仅取其‘形’而去其‘神’”^②，糟粕多于精华。这种“清承明制”论，不仅把清朝的种种弊端归咎于明朝，将明朝抹黑，而且导致“明清板块论”的出现，将明与清视为一个整体，而忽视其间的区别，抹杀明朝的特色与亮点。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一些学者强调优胜劣汰，将包括明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古代史全盘加以否定。后来，许多学者虽然抛弃了达尔文主义，而信仰别的历史观，却毫无例外地对明清两朝持批判态度，认为它们必须对中国近代的落后负责。20世纪上半期，在错综复杂而又苦难深重的政治环境里，一些进步的史学家曾利用历史来影射现实，借朱元璋和明史来影射、抨击蒋介石的黑暗统治。这种影射史学，在当时确也起到了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作用，但由于强调实用性而忽视科学性，对明代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又给明史蒙上一层灰暗的阴影^③。

西方的学者最早是通过来华耶稣会士的报道和随后兴起的中学西渐思潮了解中国的。当时中国的繁荣、强盛和高度发达的文明，曾引起他们的极大惊奇和高度赞扬。但是，到19世纪欧洲完成工业革命、开始加紧对外扩张之时，在西方的思想文化领域便出现西方中心论，继而产生了中国历史“停滞论”，认为数千年的中国社会是停滞不前、愚昧落后的，只有西方势力的进入，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又提出精神文化决定论，为中国历史“停滞论”披上理论外衣。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强调只有西方精神才能产生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中国、印度等东方文化不具备独自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气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学者曾极力鼓吹这种中国历史“停滞论”，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服务。二战结束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53《史部九·杂史类存目二》张瑄《南征录》提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77页。

② 参看潘星辉：《被扭曲与被辱没的历史》，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6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参看前引潘星辉：《被扭曲与被辱没的历史》。

后,美国等西方学者将这种“停滞论”加以发展,提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论”“传统——近代论”和“东方专制主义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又相继提出中国明清时期“高水平平衡陷阱论”“有增长无发展论”“过密型商品化论”“明代倒退论”等,将中国历史“停滞论”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形态。对西方学者的中国历史“停滞论”,我国曾有少数人加以呼应。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托派和新生命派提出的中国资本主义“外铄论”,实际上是西方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翻版。5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展开,中国历史“停滞论”遭到反驳,逐渐趋于沉寂。但到80年代,随着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批判和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延续问题论争的展开,又有学者提出近代资本主义为欧洲文明独有论、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论、中国单纯农业经济论。在中外各种历史“停滞论”的视野里,明代的中国自然也是停滞不前的,只有依靠外力的冲击,才能打破平衡的状态^①。

上述中外学者的诸种观点,都程度不等地贬低甚至全盘否定明朝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影响着人们对明史的客观评价。而对普通大众而言,吴晗的《僧钵到皇权》、叶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三本著作的负面影响则更为显著。

吴晗的《从僧钵到皇权》和叶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都写于20世纪40年代,属于影射史学的作品。吴著开笔于1942年,第二年正式出版。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后期,蒋介石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政策,作者“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②,借斥责朱元璋的“恐怖政治”,来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作者又从1947年暑假到1948年暑假对该书进行改写,并改书名为《朱元璋传》,以呼应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叶著开笔于抗日战争即将结束、蒋介石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的1945年,完成于蒋介石集团崩溃前夕的1948年,“这时候在蒋管区一方面是蒋介石的血腥统治和勾结敌人的卖国

^① 参看张显清:《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由来与发展》,载《张显清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吴晗:《朱元璋传·自序》,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页。

行为的变本加厉，一方面则是人民民主运动蓬蓬勃勃日益高涨起来，而蒋帮特务的镇压、逮捕、屠杀也越来越厉害。在那时想写文章公开攻击他们的罪行，是没有办法发表出来的”，于是“就想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儿来隐射”，借明代的“特务政治”来影射、抨击蒋介石的血腥统治^①。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这两部著作采用指桑骂槐的写法，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从而激起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和仇恨，在当时产生了推动人民民主运动的积极效果。

但是作为影射史学，这两部著作都存在两个共同的弊病。第一，强调实用性而忽略科学性。吴著以朱元璋类比蒋介石，丁著以明王朝类比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为了强化影射的效果，吴、丁两部著作还对明初及明代的史事进行扭曲的演绎或错误的论定，以突出其残暴和黑暗。《从僧钵到皇权》一书共分五章，以记述朱元璋一生的事迹。其中用以影射蒋介石的《恐怖政治》一章，占到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而对朱元璋在洪武建国之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则一笔带过，特别对他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的重大决策和成就更是略而不谈。不仅如此，书中还把朱元璋所强化的皇权说成是历史的“极峰”“最高峰”，并未加审核地引用一些明后期野史稗乘关于朱元璋迭兴文字狱的失实记载，把他描绘成一个多疑猜忌、残暴嗜杀的暴君，从而使洪武一朝的历史变成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改写后的《朱元璋传》，不仅基本框架未变，而且在《恐怖政治》一章中补充大量材料，使影射的色彩更加强烈。《明代特务政治》不仅写了明代特务机关厂卫的种种暴行，而且把明代的内侍机构——宦官二十四衙门也定为特务机构，将宦官干政、监军、采办、管理皇庄田地、充当矿监税使等都说成是特务活动，将明代政治说成是黑暗、暴虐和血腥的“特务政治”，没有丝毫的亮色。

第二，历史评价的失准。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既有道德价值标准，又有历史价值标准。能够完全符合这两个标准的人物和事件毕竟少见，更多的是存在这样那样缺陷的人和事。因此，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不

^① 叶丁易：《明代特务政治·自序》，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仅要用道德或伦理价值标准,更重要的是需用历史价值标准,来判断此人和此事对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究竟是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吴晗和叶丁易的两部著作,对朱元璋和明代政治的评价,更多的是使用道德价值标准,着重谴责、批判、抨击其阴暗面,很少甚至不顾其对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贡献,不免失之于偏颇。后来,吴晗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先后两次对其著作进行修改。1965年出版的《朱元璋传》第四个版本是最后的定稿本,这个定稿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朱元璋重新作出评价,认为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卓越的人物”^①。不过,该书毕竟改定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难免带有那个时代史学论著的通病,即过分突出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从而削弱、冲淡了历史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掌握和运用并不那么到位。而且这部定稿本,除新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章外,基本上仍沿袭第一、二版的框架而稍作调整,加以扩充,许多章节的内容和史事的论定,与第一、二版大体相似,没有大的改变。因此,这个定稿本也就未能改变前两个版本所描绘的那个多疑猜忌、残暴嗜杀的朱元璋形象。叶丁易则不幸于20世纪50年代英年谢世,未及就《明代特务政治》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订。

普通大众一般是通过当代人撰写的历史著作了解往昔的历史的。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他的《朱元璋传》文笔生动活泼,简洁流畅;叶丁易是文学史专家,他的《明代特务政治》文笔也很漂亮,没有一般史学著作的沉闷枯燥之感,这两部著作自然也就成为普通读者了解明史的首选之作。《朱元璋传》定稿本问世后,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一再重印,《明代特务政治》也于1983年由群众出版社重印。它们对明史的错误论定,也就随之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给人们留下明代是个灰暗年代的深刻印象。

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英文版,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文版,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后来,三联书

^① 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01页。

店又将它作为“黄仁宇作品系列”之一种一再重印，流传很广。黄仁宇的明史观，比“停滞论”更进一步，明确提出明清社会“倒退论”“衰落论”。他认为，西方现代社会是“以商业组织作为国家基干”，能在组织技术上进行“数字管理的国家”，明代中国是“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不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的国家”。一个国家，能否“在数字上进行管理”，是能否成为现代化的关键。精密计算是西方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资本主义为西方所特有，中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哪怕是资本主义萌芽，只有在外力的作用下，中国才能被动地实行“现代化”。黄仁宇就是从他的这种明史观出发，采取“大历史”的总体设计，运用“以论带史”的方法，剪裁历史，拼凑材料，写成《万历十五年》一书的。该书作者称：“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意在说明“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的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维持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①。

黄仁宇以论带史的做法，不可避免地给《万历十五年》带来两个显著的弊端。一是以偏概全。明代中国有落后的一面，但并不是什么都落后，更不是倒退。明朝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超过了前代的水平，也不落后于西方，以综合国力而言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看不到这一面，我们就无法解释明朝的统治何以能维持 277 年之久，也无法解释晚明时期的中国何以能在东方贸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屡次击败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明末的郑成功能把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万历是晚明时期的一个重要时代，此时政治上固然保守、僵化、腐朽，经济上却是十分活跃的，随着白银货币化的完成，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市镇的崛起，私人海外贸易的兴盛，新的经济因素正在滋长，社会结构正由单一的农

①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文版《自序》，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4 页。

业经济,向着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转型。如果看不到万历时期经济活跃的一面,我们就无法理解当时社会风尚的剧变,思想文化界“工商皆本”及异端思想的出现。就以《万历十五年》所写的六个主要历史人物而言,他们一生的活动是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如明神宗平定倭寇之乱、御倭援朝、平定杨应龙之叛的“万历三大征”,就都获得了成功;张居正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完成,国家赋政体系由以实物为主向以白银为主转变;戚继光扫平东南倭寇,构筑北方防线,更在明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有这些,显然不能因为传主的“身败”或“名裂”而一概归入“大失败的总记录”之中。二是对史料采用各取所需的做法,搞“六经注我”。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黄仁宇在书中对史料采取了极不严肃的处理办法,不仅与自己观点相左的史料一概摒弃不用,而且对所征引的史料多有误读、歪曲或篡改之处。如该书第五章谈到海瑞的节俭时写道:“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文末注明出处为“《明史》卷 226(“台湾国防研究院”1963 年版)页 2602;《海瑞集》(中华书局 1962 年版)页 586;《国朝献征录》卷 64(〔台北〕学生书局 1965 年版)页 38”,似乎证据确凿,毋庸置疑。但海瑞是回族人,回民禁猪,他怎么竟敢违背伊斯兰的教规和生活习俗,公然买了两斤猪肉给母亲祝寿呢?一查史料原文,《明史》《海瑞集》《国朝献征录》写的都是买“肉二斤”。肉是个大概念,包含猪肉、牛肉和羊肉等,但就海瑞而言,就只能指牛肉或羊肉,而绝不是猪肉。由于作者错误的明史观,加之违反史学研究的规范,对史料采取各取所需甚至歪曲、篡改的手段,《万历十五年》对具体史事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可靠,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失之偏颇、片面^①。不过,普通大众一般不会去认真核对史料,而被作者一再鼓吹的“大历史观”所迷惑,为其生动的文笔和新奇的论点所吸引,为之叫好,从而加深了对明史的错误认识和负面评价。

^① 参看陈梧桐:《〈万历十五年〉质疑》,《历史学家茶座》总第 4 辑(2006 年第 2 辑);《散叶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0—56 页。